

小岛丽逸先生采访录

时间：2007 年 10 月 19 日

地点：涩谷东急旅店会议室

第一部分

泽田：今天是 2007 年 10 月 19 日，我将在这里对小岛丽逸先生进行采访。下面，我将向小岛丽逸先生提出几个问题。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经过。

小岛：那是因为没有工作接受单位。

泽田：那么，您是哪一年毕业的？

小岛：1960 年 3 月。

泽田：说到 1960 年 3 月，会令人想起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

小岛：是的。我不是病了大约 4 年吗？大学毕业时已是 26 岁，受到当时年龄的限制，没能到企业就职。因此，查询了许多前来大学进行招聘的公司和研究所，我发现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招聘书中标明“可招聘 28 岁以下学生”。由于身体虚弱，难以胜任企业的工作，无奈便决定进研究所试试。情况就是这样，并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泽田：也就是说，您不是为了研究中国而特意选择研究所的？

小岛：不是的，因为我的第二外语是中文。说是第二外语，也只是在一、二年级每周上两节课，但自己也曾利用一些业余时间自学，这或许构成了我的卖点吧。我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学系。当时，在与我同届的学习经济学、政治学专业的毕业生中，几乎没有人从事中国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也因此才选中的我吧。

泽田：听说当时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性质与现在有着很大的不同。

小岛：并没有什么不同。

泽田：一直在同一研究部门工作吗？

小岛：是的。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于 1959 年 7 月，当时招聘了首批毕业生，当年秋季又招聘了第二批。在招聘第二批毕业生时，我恰巧发现了张贴在大学墙壁上的招聘书。

泽田：在校期间，您撰写过有关中国的文章吗？招聘您，难道完全没有外语以外的因素？

小岛：完全没有。

泽田：那么，您在大学时代，关心过哪些事情并进行过研究？

小岛：由于家庭状况的原因，我没有做过任何研究项目。父亲去世较早，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一直在做勤工俭学。尤其在我读四年级时，患有胃溃疡的妈妈曾三次吐血，甚至连治疗费也付不起。因此，我和兄弟们都必须去工作，以补贴家庭生活。为此，我兼做家庭教师，每周都上 9 至 10 次课。生计问题令我无暇他顾。

泽田：您的兄弟姐妹共有几人？

小岛：5 人。当时最年长的大姐已经出嫁，我排行第三，4 个男孩，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还在读高中。由于家里没有什么财产，所以必须自己去谋生计。生计问题是头等大事，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将来做什么。而且，我在患肾病的 4 年时间里，不知何时会死，也不知能够活到何时。虽然 4 年后复学，但与普通学生相比，年龄已经大出了许多，加之身体虚弱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所以我才非常偶然地进入了亚洲经济研究所。

泽田：这么说，是否可以认为您的中国研究是从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时开始的？

小岛：是的。首先，当时亚洲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大概认为我既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学系，一定做过一些经济学的研究。其次，虽然那个年代有一些与旧满洲铁路或东亚研究所有关系的上一代中国研究专家，但却没有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我是 1953 年升入大学，1960 年 3 月毕业，总共用了 7、8 年的时间。当时，一桥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是按照第二外语分班的。学生大约有 440 人，其中 6 成以上选修德语，32%到 33%选修法语，接下来是俄语，再有就是中文。440 名学生中，选修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只有 6 名。负责讲授中文的是雄野正平老师。然后，按姓氏的德语字母顺序排列，每班 40 人，排在法语字母后列的学生则被安排在了后面。接下来是选修俄语的 20 多人和选修中文的 6 人被编在了最后的混合班。

泽田：这仅限于经济学系学生还是所有一年级新生？

小岛：所有一年级新生都是按这种方法分班的。第一次考试是笔试，第二次是面试。面试时，进行了第二外语登记和体检。来到面试室，考官问我：“你是选修中文吗？”后来知道，这位面试考官是财政学系的木村元一老师。考官曾说：“你是选修中文吗？学校可负责不了（选修中文学生的）就职呀。”“为什么？”我问。“因为是赤色分子呀。”考官回答。总之，人们认为选修中文或俄语的学生具有共产主义取向，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曾有过这样的风潮。在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不但中国研究专家，甚至俄罗斯研究专家也都遭受过迫害。都留重人先生曾被美国国会传唤，要求出具证言。这一风潮也传到了日本。加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当时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大都是俄语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东京外国语大学也不例外。我后来明白了在这一背景中的木村先生话的意思。

泽田：当时，你们 6 位选择中文的人是否被认为是好事之徒呢？

小岛：是的，也的确是好事之徒。

泽田：选择中文的人很少，是否意味着您大学毕业时，在全国范围内学习中文的人也不多呢？

小岛：我想是吧。因为毕竟不是在外语大学专门学习中文，只是第二外语而已。如今情况也是如此，在日本的大学学过外语的人，恐怕没有谁能把它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吧。这就是左右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学生思想的社会现状。所以说，我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纯属偶然。

泽田：您没有考虑其他的职业和专业，首先选择了中文，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呢？

小岛：当时，我姐姐的丈夫，即我的姐夫在中部电力工作，当时工人运动非常频繁。我姐夫就劝我，“既然升入了大学，就学些中文吧。”这就是我的动机之一。另一个动机则是，与我年纪最接近的哥哥在众议院事务局工作，我到东京后，他对我也说过类似的话，“这个国家会强大起来的。”虽然是事务局，但毕竟在众议院工作，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信息吧。由于哥哥劝我“学些中文吧”，所以我也就回答说“嗯，好的”。就这样，我在中文一栏打了勾。

泽田：您的姐夫在中部电力是搞劳资关系的吧？

小岛：是的，在工会工作。

泽田：是专职的工会工作吗？

小岛：不。虽然不是专职，但当时的工会里也流行着这样的看法。

泽田：这样说来，您之所以选择中文，影响不是来自学校或媒体，而是来自您身边人的建议？

小岛：是的。

泽田：接下来回到前面的话题。您升入大学后，每天都是忙于打工，其间学到的东西是否对您之后的研究产生过影响？

小岛：那倒没有。只是我出身于普通家庭，了解乡下农民的生活。因此，在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后，谈到从哪一方面开始着手研究时，便选择了自己所经历和懂得的农民这个方面。于是，我就开始了中国农业领域的研究。

泽田：这样说来，是否意味着与学校的学业相比，您此前的自我生活积累的影响更大些？

小岛：是的。但在一桥大学的研究班中，有一位讲授《资本论》的种濑先生，他后来升任了校长。他在任期最后的3月下旬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一桥大学包括中山一郎先生等人，现代经济学是强项，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老师，那便是种濑先生。一桥大学有经济研究所，不为本科生授课，而是面向研究生院的研究生。研究所里既有都留重人先生，也有研究苏联经济的冈稔先生以及研究中国经济的石川滋先生。因此，研究班的种濑先生曾建议我，“如果想写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研究所里有这方面的老师，你不妨去向他们请教一下。”

泽田：那么，在种濑先生的研究班里读了《资本论》后，您曾向石川滋先生求教过吗？

小岛：由于《资本论》部头很大，用本科的两年左右时间很难通读下来，所以只选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撰写论文时，石川先生曾建议我，“读一读阿德勒(Adler)的《中国经济》，或许能够在阅读过程中得到一些启发。”当时这一著作属于非常难得的一部译著。那时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泽田：当时有关中国经济的书大都是未经翻译的原著吗？

小岛：译著很少呀。除阿德勒的《中国经济》外，我记得还读过另一部由香港大学的前身——崇基书院或其他什么单位的一位名叫李卓明的先生撰写的英文著作。总的来说，我甚至没有更多地系统学习过经济学，只是在本科3、4年级期间蜻蜓点水般地学过一些，这些只能说是经济学的皮毛吧。当时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大概认为，既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经济学或许是其强项吧。正如前面所讲，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中有与满洲铁路调查部有关者等上一代人。总之，都是“中国通”。他们虽然中文非常好，却几乎没有接触过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于是，他们中的几个人便开始从大量的史料着手，开展了各项研究。这些人中有的为中国研究所聘用，其他则分布在全国各地。我想，在这一方面，石川滋先生应该算是最早利用国民收入分析方法，从宏观经济学领域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分析的学者。那时的知名学者有三人：政治学领域的庆应大学石川忠雄先生、东大的卫藤沈吉先生及经济领域的石川滋先生。虽然在历史领域有市古宙三先生，但由于其专业为历史领域，而“现代中国”则属于政治范畴。因此，三人分别是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石川忠雄先生、研究外交等中国政治的卫藤沈吉先生以及经济领域的石川滋先生。

泽田：您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什么？

小岛：记得曾写过两篇毕业论文。研究班的种濑先生是《资本论》的专家，多次建议我写有关“再生产论”。这与其后的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相互关联，我撰写了有关如何解读马克思所描述的显示经济整体循环内容的经济表问题。这是一篇。另一篇没有正式登记。当时担任中文的熊野正平先生要求我一定要写一篇有关中国的东西，于是我便根据阿德勒的译著，提交了一篇有关中国经济状况的论文。准确地说，这一篇应该算作补充部分。

泽田：这些是您独立完成的论文吗？

小岛：不是。谈到毕业论文，在一、二年级时，曾以中文写过一篇向授课老师表示感谢的文章。我记得当时的确写过，但如今已经不知所踪。

泽田：哦，很遗憾呀。如果这篇文章还在，我还想复印一份留作资料呢。如果与此次访谈相关的类似照片或资料，那都将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请一定让我复印一份。接下来是有关您的就业问题。是否可以认为与其说您选择了中国研究，莫若说是亚洲经济研究所选择了您？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会后，您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我想一定会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具体而言，选择这一课题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小岛：亚洲经济研究所不是派年轻人到国外的吗？当时，亚洲经济研究所正值创立初期，包括普通事务职员、图书馆员及从事研究的人员在内，共有 18 人。其中，只有两人毕业于经济学系。

泽田：是指 18 人中只有两人毕业于经济学专业吗？

小岛：是已经去世的印度研究专家伊藤正二和我。

泽田：伊藤先生与您同届吗？

小岛：是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在向海外派遣人员时，便选中了我们两人。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是亚洲经济研究所，便优先选派经济系毕业的人。最初的一年里，我几乎没有从事过研究类的工作，只是做些杂事。一年后，便去了香港。

泽田：这么说来，您是在 1962 年被派往海外的吗？

小岛：不是，是 1961 年 4 月。

泽田：您被派往的是香港的中文大学吧。

小岛：不是中文大学，是香港大学，那时还没有中文大学。谈到国际关系现状，当时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发达国家中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虽然各发达国家需要培养外交官，但各国外交部却无法向大陆派遣新参加工作的年轻职员。于是便只能或派往台湾，或派往香港。因此，一道学习中文的人中，有非常多的人后来成为了外务省的职员。

泽田：那么，您前去的地方是香港大学的语言中心吗？

小岛：是呀，我想应该是它的前身吧。

泽田：您也因此认识了殖民地时期倒数第二届的总督卫奕信（David Wilson）吧。

小岛：是呀，我们因此相识。

泽田：对了，我在香港时曾听说您与总督曾是同级生。

小岛：我是那时与**卫奕信**总督认识的。此外，还与印度外交部的一位叫**达斯(Dass)**的人一道学习汉语。他的中文非常好，同学们都叫他“打死”。当时，美国的著名大学为了让学生完成博士论文，会派相当于日本的博士 2 至 3 年级学生到海外学习一年。因此，在香港我认识了德怀特·珀金斯 (Dwight Perkins)。他当时已经结婚，是带着妻子一道来香港的。我也是结婚后和妻子一同去那里的，因此每周都带妻子前往他们家做客，妻子教珀金斯妻子中文，珀金斯夫人则教我妻子英语。两个男人则海阔天空地聊天。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珀金斯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副教授，记得他获得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精通经济学，尤其是波兰的奥斯卡·兰格以数学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的资源分配完全能够搞计划经济”问题。他以此为依据，作过多次演讲。我并不了解相关情况，只是在与他的讨论中隐约感觉到一些。我也并非真心想学，但这种相互探讨持续了一年左右。在我其后整理自己想法时，这些探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进而感到“原来经济学会有如此的作用呀”。恰在这一时期，石川滋先生获得“日经出版奖”的《中国的资本积累原理》一书出版。这部书由岩波书店出版，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一部名著，其内容是润进所说的开发经济学。石川先生特意送我一部，我认真地阅读了该书。石川先生撰写时使用的结构是马哈拉诺比斯 (Mahala-nobis) 模型。这人是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者，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统计学家，属国大党派，曾是尼赫鲁总理的得力助手。

泽田：是国民议会左派吧。

小岛：是的，他曾与原外交官及驻联合国大使梅农 (Menon) 交好，也曾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因为周恩来制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马哈拉诺比斯访问北京时，曾应邀前往位于中南海的周恩来私邸。石川先生的著作是以“马哈拉诺比斯模型”为基轴，应用哈罗德·多马 (Harrod-Domer) 理论，即从宏观角度应用国民收入概念展开分析。其重点是以算式来论证“在开发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将来可促进经济发展”。在当时独立的国家中，印度于 1951 年最早提出了五年计划，这比开始于 1953 年的中国早了两年。在这种环境下，对运用何种模式来制定经济计划，无论是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还是联合国，都对不发达国家经济论的分析显示出了极大的关心。应用这一理论，对截至 1957 年的中国经济进行分析的正是石川滋先生的《中国的资本积累原理》。石川滋先生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 的理论。这是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的理论，记得在日本也有译文版。石川先生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根据的是莫里斯·多布的著作，其理论属于“瓶颈模型”。所谓“瓶颈模型”，是指从较低水平发展经济时，政府将资源、财产、资金集中到中央后，投向重点产业。于是便导致某一地方出现“瓶颈”。这一模式被称为“瓶颈模型”。这一模式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因此，发展的“引擎”是参考了哈罗德·多马的模式甚至哈罗德的分析模型，认为经济取得发展后，将会在某一地方出现瓶颈。这便是莫里斯·多布所分析的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经济的状况。当某一地方出现瓶颈时，最受关注的便是商品粮问题。

泽田：“商品粮”是指实现了商品化的粮食吗？

小岛：农民生产粮食，如果全部吃掉，就不会再有所存储。城市人口在不断增长，必须有所售出。这些供城市人口食用的粮食，英语称之为“marketable grain”或“marketed grain”，这便是商品粮。得出这一将成为最大瓶颈分析结论的正是岩波书店出版的他的《中国的资本积累原理》一书。那是一部名著呀。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人会认为将重点放在这一问题上有些可笑，但当时中国尚处于食不果腹时期，存在着如何从农民手中获取粮食，养活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这一最大问题。因此，我认为，从以此为主轴展开分析的角度看，即使是在今天，石川先生的这部著作的价值也没有丝毫的降低。

泽田：您在香港对这部著作进行分析并汲取其中营养之时，恰值中国的大跃进时期吧。

小岛：刚好是大跃进走向失败的时期。我不是在 1960 年 4 月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吗？我是 1961 年去的香港，所以正值最严重的饥荒时期。当时，香港人把粮食装进大大的袋子里，不断从位于中环的邮局邮寄出去。再有，一到年前，人们便挑着担子回乡。对此，我并不认为如何严重。但身为美国人的珀金斯则有着不同的看法。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从拥有庞大人口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将会垮掉”。珀金斯也参与了这一论题的执笔。我与珀金斯每周一次，一直就这一问题及西藏问题进行讨论。在他的家里，我们就像吵架一般，口若悬河地不断讨论，但由于自己的水平过低，难免有时会怒火攻心。于是，珀金斯便回头对妻子说，“赶紧把菜刀、厨刀藏起来！小岛开始亢奋了！”这种情况曾经常发生过。与他的这一年多的争论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帮助。因为是用英语进行争论，所以我的胆子也变大了些。最早的论文——当时的香港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是一位叫**科比（Kirby）**的人，他几乎没有什么著述，他的同事是一位美国教授，叫塞帕尼兹（音译）。他学习非常认真。

泽田：香港大学的经济学系现在已改称经营系（Business & Management）。

小岛：是很自然的事情呀。香港大学经济学系出版的年报曾约我写些东西。当问及“用哪种语言写”时，对方回答说“英语”。香港大学全部使用英语，所以自然要我用英语写。因此我便勉强写了一篇。自己的英语不是很好，因此求珀金斯帮忙修改。结果，珀金斯给我改了个满篇通红，并对我说，“哎呀，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说“太糟糕了”。这对我来说打击不小呀。由于打击过于沉重，其后，我便不再使用英语。他可真是个闲人，也没有向谁告知自己每天去向的义务。记不清是前年还是去年，日本经济新闻社邀请他访日。由于他是携夫人一同出席此次大型讲演会，我便与他们见了面。当时，我告诉他说：“由于你的缘故，我的英语一直没再有什么长进呀。你本不该那样说的。你应该先对我的文章表示赞赏，然后再说‘应该改成这样’。这样说该多好，但你却说‘太糟糕了’。你忘了，这点儿英语我还听得懂。”听我说完，珀金斯扑哧一声笑了，“我这样说过吗？”看来让人泄气**还是有办法呀**。

泽田：当时的英文论文是您最初发表的著作吗？

小岛：大概算是吧。题目是“Grain Acquisition in China”（中国的粮食收购）。刊物好像 SOAS（SOAS：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有关系吧。

泽田：现在香港大学仍然在和伦敦大学合作，并承认英国的学位。

小岛：我也是顺便搭车。

泽田：这么说，如果到 SOAS 查找，就能够检索到您的论文吧。

小岛：嗯，不知在 SOAS 是否能够查得到，但在香港大学大概会有吧。

泽田：好的，我查查看吧。但愿能够找得到。

小岛：那篇论文是我自己收集资料后试着完成的，因此也清楚了石川先生所提出的商品粮不足问题是如此的严峻。在 1917、1918 年社会主义革命后新诞生的苏联，列宁于 1921 年开始征收粮食税。列宁曾做过著名的演讲“正在逼近的粮食危机”。究其原因，引入农业税理由有二：首先，农民由于粮食不足，导致无法出售手中的粮食。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以前地主通过剥削农民征集粮食的体制被打破。因此，农民才得到了粮食。进行了这场革命后，便遇到了这一问题。调查后发现，中国也出现了完全相同的情况。再者，苏联陷入粮食危机是由于它曾是粮食出口国，饥饿时期仍然出口粮食。这是因为它获得外汇的途径仅此一条。基于这两点理由，列宁在新诞生的苏维埃的革命之后，便开始征收粮食税。记不清是在第几卷了，相关的内容是记载在《列宁全集》的开始部分。这算是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背景吧，正是石川先生的《中国的资本积累原理》为我提供了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问题。

泽田：原来是这样呀。亚洲经济研究所派您出国是为期两年吧。您在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第二年撰写了这篇论文，但当时是无法前往中国大陆的，您是如何收集资料的呢？

小岛：是通过联合调查中心（Union Research Centre）。

泽田：是友联（Union Research Centre）吗？

小岛：美国向联合调查中心投入了巨额资金，收集了很多中国的地方报纸，于是有了很多剪报。

泽田：是现在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吗？

小岛：那里是按问题类别对发表在地方报纸上的报道进行剪报收集的。例如，某地抵抗政府强制捐款等，这样的报道有很多。从此可以分析出中国农民的困苦程度。实际上，在 1953 年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起农民示威活动。那

一时期，中国的粮食收购是由镇政府负责，仅从镇政府当时的发言中，也能够分析出其苦于商品粮严重不足的情形。而且，当时在城镇粮食供给方面，为抑制需求增加引进了配给制。向国民配给粮食，这在中国 2000 年的历史中大概尚属首次。农民虽然自己拥有粮食，但他们仍要求说，“我们也需要粮食！”虽然《人民日报》对这一情况没作任何报道，但地方报纸却有过多相关的报道。

泽田：您是以这些报纸资料为主，边分析中国现状，边进行理论研究的吗？

小岛：我的理论研究为零，从未做过理论研究。

泽田：听您讲，似乎在那一时期，您不是在学会，而主要是与石川先生、珀金斯先生等私人之间的切磋进行交流的。那么在回到日本后，仍然是这样的情形吗？或是加入过某一学会？

小岛：我在 1963 年回国时，亚洲经济研究所设立了研究指导顾问等职位，任用了两、三位著名学者，石川滋先生便是其中之一。顾问主要负责为年轻人解疑答惑，或组织研究会等工作。石川先生组织研究会时，他对我说：“你负责研究会事务吧。”于是，我便开始了事务性工作。但是，石川先生从来不会说“你写这一方面的论文吧”之类的话。虽然当时的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部部长的人也指派一些年轻人负责执笔，但石川先生却对我说，“由于你在国外两年几乎没有拿出什么成果，所以不能安排你参加项目。”

泽田：是当时的调查研究部的研究会吗？那一时期，曾有过许多研究会吧。

小岛：大概是调查研究部长向石川先生说过吧。因此，石川先生对我说，“虽然在这两年间你花掉了很多钱，但却几乎没有成果。我们不能接纳你这样的成员。”

泽田：不是让你负责事务工作吗？

小岛：是呀。

泽田：那么，作为事务担当者，您自然成了研究会的成员了吧。

小岛：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年多之后，石川先生第一次问我，“写点什么吧。”他负责课题任务的分派。安排给我的部分是“中国的化学工业”。我对这一领域是全然不知的。

泽田：因为您当时的专业是“粮食”嘛。

小岛：无奈之下，我开始学习化学工业，撰写论文，并提交给负责人。后来，石川先生对我说，“你来一下。”到了他那里，我发现每一页上都贴上了 4、5 张便签。石川先生把那篇论文“嘭”地一声掷给我说，“现在还来得及，你换一换工作吧！”当真是声色俱厉呀。以至于妻子都觉察到了我其后两周多的变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妻子说，有人说我“不适合做亚洲经

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换工作吧’”。迫不得已，我想到了一桥大学的村松祐二先生，便前去找他商量。我曾在村松先生的家中作了一年的看门人。

泽田：是住在那里的吗？

小岛：不是的。村松先生曾出国 2、3 年，但他家里没有人看门。一桥大学与中国有关的老师之中有前面提到的中文专业的雄野正平先生、石川滋先生以及思想专业的西顺藏先生。西先生还曾加入过中国思想研究小组，当然这是一些题外话。作为第二外语，我曾在 1、2 年级时跟着雄野先生学过中文。雄野先生对我说，“你去村松老师家，替他看一年家吧。”

第二部分

泽田：您刚才谈到了为村松祐二先生看家的事情。

小岛：除我之外，还有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在那里住了一年。每月报酬是 5000 日元。

泽田：当时的 5000 日元吗？

小岛：是的，很可观呀。我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后被派往香港，回国时，村松先生已经回到了日本。所以，我前去拜访村松先生，就改换工作的事向他求教。

泽田：是调动工作的事情吗？

小岛：是的。村松先生没有孩子，他的夫人是战争期间曾出任济南或其他什么地方总领事的西田公使的女儿，叫华子。于是，村松先生突然喊：“华子，拿酒来！”将酒倒入茶杯便对我说，“你也来喝点儿吧！”然后，就只说了一句“好痛快呀”，不复他言。我把事情如此这般地讲给他，他也不置可否，只是说“喝酒”。看来没指望了，我便说“我先回家了”。来到门口穿鞋时，他说了一句，“花钱也不会有人告诉你答案的。”而就是这句话产生了效果。

泽田：谈到如何选择研究课题，您是接受石川先生“你写化学工业”的安排后，便开始着手撰写论文，并在其后的一年里潜心进行研究的吗？

小岛：是的。初稿完成后，就提交给了石川先生。

泽田：无论是在化学工业领域，还是在中国研究领域，您都认为自己受益匪浅吗？

小岛：题目的范围有些过大。光研究农业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应该让题目更灵活一些才好呀。

泽田：哦，您认为“题目更灵活一些才好”。

小岛：到后来，我发现这些事情“啊，原来如此。这一预测，石川先生曾经提到过吧。”因此，让我“改换工作吧”，大概是对我进行试探，看我是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还是认为“好，我就发奋做给你看”吧。如果只是石川先生，或许我真的会垮掉。所幸的是还有一位爱说“拿酒来”的先生，所以我才能够坚持下来。虽然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去村松先生那里，或许是难以承受这样的精神重压吧。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我大学毕业延迟了4年。那时应该是在30岁或31岁吧。你在刚来亚洲经济研究所时，不也曾和我商量过“不来亚洲经济研究所，想去研究生院”的吗？

泽田：是的。您当时让我“不管怎样，先做做看”。

小岛：那是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泽田：我们学校（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石崎菜生（现为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外国语大学汉语专业毕业）也谈到过自己同您商量时，您也同样告诉他“先试试看”。

小岛：是研究韩国经济的石崎吗？

泽田：是的。听她说，当被告知“研究韩国经济吧”，觉得自己需要从零开始学习韩语时，她曾感到一阵晕眩。但现在她一直在研究韩国经济，据说已经成为了韩国经济方面的专家。

小岛：是吗？我想自己之所以会对年轻人这样说，是受到了石川先生及村松先生的影响。因为在我穿鞋时，村松先生只说了一句“花钱也不会有人告诉你答案的”，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前言后语。

泽田：您的意思是需要有理解能力吧。那么，您一直参加了石川研究会吗？

小岛：是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不是出过三册《中国经济长期展望》吗？

泽田：“长期展望系列”吧，有过。

小岛：那正是我其后正式研究工作的经历。“长期展望”不仅包括宏观领域，还被分割成了各个产业部门以及中国经济出现了何种瓶颈问题等。还是石川先生思维敏捷，我想他一定是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架构。因此，他给我们分派了各种工作，我甚至还做过机床方面的研究。

泽田：机床？是当时的中国机床领域吗？

小岛：是的。

泽田：哇！课题名称是什么呢？

小岛：当时的相关资料几乎为零呀。关于机床，我曾认真学习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机床。当时我住在足立区的一处名叫畑的住宅区，附近有一家私营工厂，于是便请求他们能够允许我前去参观。“这是车床。这是铣床。这是钻床。”我让他们启动机床，指着实物给我讲解。去过一段时间，我加深了对机床的了解，“啊，原来这就是机床呀”。我曾学过很长时间的机床知识呀。当时每隔 1 至 2 年都在晴海、大阪举办世界机床博览会，我因此去了许多次大阪。

泽田：是参加“世界机床博览会”吗？

小岛：嗯，是“机床展览会”或“商谈会”之类的活动。如今已经不再举办了。因此，为撰写机床方面的论文，我花费了 7、8 年的时间。这样，在学习机床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发现“啊，这才是机械的机械呀”。简而言之，就是“工作母机”。我开始意识到，如果这一行业不能获得发展，整个机械工业就不会有发展。我阅读了许多有关机械工业方面的书籍。在化学工业课题之后，我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农业的研究我也继续在做。因此，必须做的研究共有三、四项之多。从那时起，我应该算是从石川先生那里独立了出来。

泽田：当时，石川研究会是您主要参加的研究会，除此之外，您还参加了其他研究会或学会，发表过论文吗？

小岛：接受到石川先生的安排，在撰写有关机床方面论文时，曾在亚洲政经学会发表过一次论文，但我对学会不太感兴趣。

泽田：这是您的原则吗？

小岛：完全不是这样的。不知为什么，自己完全没有想加入这样的组织，在大家面前讲一些“我在做这样的工作”之类的心情。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泽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您有了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发表论文的平台吗？

小岛：大概是这样吧。既有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发表的平台，也能够在研究会等部门发表。我想原因大概如此吧。

泽田：据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政治经济学会是美国式的，西洋式的学会，历史研究会中则以马克思经济学者居多。此外还有现代中国学会。您只是在亚洲政经学会作过一次报告吗？

小岛：只在亚洲政经学会作过报告。我既不曾加入过中国学会，也不曾加入过亚洲政经学会。之后，1963 年发生了“福特基金会事件”。简而言之，那好像是一次美国的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想招聘日本的年轻研究人员开展中国研究的活动。牵线搭桥的人是市古宙三先生和村松祐二先生。总之，亚洲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了其主要成员。据说为此曾举办过“反对美国侵略”的大会。我也曾经受邀，但没有参加。自己根本没有过不希望参加这一活动，或不参加这一活动将会落伍之类的想法。这有些不可想象吧。

泽田：是这样呀。这一事件刚好发生在中国文革开始时期吧。

小岛：不是，还没开始，还没有发展到那一阶段。

泽田：您研究机床问题曾花费了 7、8 年的时间，农业和机床问题的研究结束时，是否已经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小岛：嗯，应该是 1964 年、1965 年前后吧。

泽田：当时中国进入调整时期，那属于刘少奇时代吧。

小岛：的确是那一时期，但我们对此并不知情呀。

泽田：是因为没有获得相关信息吗？

小岛：没有得到。因为自 1964 年 4 月开始，中国的所有印刷品都不再出口海外。不过还有两种，一种是《人民日报》，另一种是《红旗》。

泽田：是《红旗》杂志吧。

小岛：只有这两种在向海外出口。但其中几乎没有刊登过失败的事情。例如，关于今天非常有名的 7000 人大会，也只从中知道那是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其他任何情况都没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记载有多少人口等的相关统计数据。也完全没有关于原钢——即所谓铁的产量有几万吨的统计。甚至连粮食的产量有几亿吨的统计也完全没有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在石川先生的研究会里，计量数据被列为重要内容之一，我曾被要求完成一份投入产出表。我没有按照要求去做。

泽田：是因为投入产出表无法完成吗？

小岛：嗯。我个人认为，如果不能填入大量的数据就无法完成。就钢铁产量而言，如 1964 年为多少万吨等，推算起来会非常困难。当时的做法是，由于石川先生要求有数据，于是便彻底查找了与日本经济状况相同时期的数据，并对印度进行了研究。从这些资料中，类推出这一规模的经济水准期间会出现多大数量的钢铁需求。粮食也是如此，人口的推算比较准确。尽管如此，从其后发表的人口数据看，我们对自己过低的评估感到愕然。推算的数据不准确呀。

泽田：原来如此，过低评估了其人口数量。是由于人口大爆炸吗？

小岛：不是，是我的计算数据中的估值过低。

泽田：您的推算数据过低，是由于当时中国人口大爆炸超出了您的预测数值吗？

小岛：是的。今天的人们认为，大跃进失败曾导致 3000 万至 4000 万人被饿死，

但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一情况的发生。如今，相关资料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而且数据也层出不穷。这与当时的情况截然相反。偶尔读些相关文章，就会获得与上年相比增加了3%或10%等数据。这些数据都被忠实地记录下来。而且，从印度或日本——与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期状况类似——的经济状况进行类推，便可推算出大体的数据。

泽田：原来如此。

小岛：在这一方面，深得要领且做得较好的，要算是加加美光行了，他也是成员之一。其他成员还有矢吹晋及自杀身亡的田近。

泽田：是后来去了爱知大学的加加美光行先生吗？

小岛：是的。所以，矢吹晋曾说：“做这样课题有些荒唐，能完成吗？”因为此前曾聆听过石川先生的教诲，因为那时我开始明白，他不是以讨厌的口吻，而是热情地为我在讲解，所以我没有离开石川先生。加加美则深得要领，“反正是要推算的。煤炭产量大概是这样。”他便噼里啪啦地算出了数据。推算工作就这样结束。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泽田：在没有计算依据的前提下？

小岛：什么也没有。

泽田：加加美先生真是了不起呀。

小岛：的确了不起。他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出色的人呀。加加美最近还出版了一部非常好的书呢。

泽田：虽然得出了没有依据的推算数据，但并没有得出反驳石川先生结论的依据。

小岛：是的。加加美则显得泰然自若。

泽田：是吗？那么，这项研究当时属于亚洲经济研究所的预算项目，以石川先生为核心进行的。您是一直踏踏实实地用公开发行的《人民日报》及《红旗》杂志，收集数据推进工作的呀。

小岛：因此，其后我便养成了阅读资料时自问“字里行间是否有其他含义”的习惯。总之，需要认真研读资料。如果像今天这样，在资料如此丰富的情况下，大概也不会有那种心情吧。

泽田：后来，您也因此学会了在与日本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中把握中国的研究方法吧。

小岛：是的。这一方法是那时学到的。

泽田：您调到大东文化大学后所撰写的各国比较统计，是否也使用了当时所掌握的方法呢？

小岛：是的。也是当时所学。因此，如果人们对我的讲义、市民讲座或讲演等，无论哪种方式的东西，认为比较有意思或浅显易懂，我想都是因为其中融入了比较的内容吧。

泽田：您说的是“比较”吗？

小岛：是的。我也因此掌握了许多有关日本及印度的经济知识。

泽田：其后，加加美先生等人参加进来，您也就有了很多晚辈。按照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做法，当晚辈达到一定人数后，您也曾被要求组织自己的研究会了吗？或者，您走的是个人研究的道路？

小岛：亚洲经济研究所不太鼓励个人研究，所以，我也组织了化学工业研究会。

泽田：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应该是文革前吧。

小岛：不，刚好是文革期间。

泽田：那么，应该是 1965 年以后吧。

小岛：曾经有过正式出版物。

泽田：稍后我到亚洲经济研究所确认吧。在您的化学工业研究会里，当时的成员都有哪些人呢？

小岛：有东京工业大学的神原先生。

泽田：是那位神原达先生吗？

小岛：是他的父亲，他曾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发表过有关中国石油的论文。他是日本塑料研究的创始人呀。他担任这项研究，并接纳了通产省的 3、4 位年轻人——因为其中也有通产省的委托部分。

泽田：神原先生的父亲当时是在东京工业大学吗？也就是说，总体是以外单位的成员为主？

小岛：是的。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亚洲经济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内部的成员可能还有石桥吧。因为他研究的是中国的肥料工业。但他过于聪明，或许说聪明有些不恰当，他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田近也因此自杀了呀。这令我感到十分惋惜。

泽田：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研究属于精神压力非常巨大领域吗？或有什么其他原因？

小岛：不太清楚。

泽田：如今，我们常常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提问。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是研究内容，就连立场、意识形态这些问题也都受到盘查。他们是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吗？

小岛：不，我想问题不在这儿，应该起因于一些日常错综复杂的个人问题吧。因为虽然今天亚洲经济研究所的评价机制非常严谨，但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评价机制或其他什么机制。在那种环境下，或许当时有人会认为：即使2、3年不拿出任何成果也能够照拿工资，这不是很轻松的差事吗？但实际上，却有着非常激烈的隐形竞争。如果意志薄弱，便会出现精神问题。因此，亚洲经济研究所里曾有几位在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由于此次访谈采取了录音的形式，最好还是不说出具体姓名的为好。据我所知，结局非常令人遗憾的人就有好几位。其中最悲惨的是采取了自杀方式的人。

泽田：原来如此。如此说来，“悉听尊便，也可以不出成果”之类的话反而益发让人感到痛苦不堪呀。

小岛：十分痛苦呀。

泽田：反而是被规定“这是题目，在某日之前完成这些内容”更好些？

小岛：这才是最轻松的。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只关心自己在哪方面有所得而已。

泽田：再谈一些有关亚洲经济研究所时期的话题。其后，您是组织了自己的研究会，并每两年出版一部专著的吗？

小岛：大概是这样的。

泽田：那么，在化学课题之后，您又从事哪方面的研究了？也同时进行了农业问题的研究吗？

小岛：已经记不太清了，应该是同时进行的。

泽田：当时，即在所谓的中国信息大爆炸之前，研究会中最为成型的研究方法或主题是什么呢？

小岛：应该算是“人民公社”呀。当时，日本处于高速发展期，城市化进程来势凶猛。

泽田：您是指日本国内的城市化吗？

小岛：是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年轻人就不断走出农村。其后，日本的农业达到鼎盛时期。由于我以前曾是农民，因此曾经期待中国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关于人民公社的思考方式，正如很多人的文章中所写，基本思路是开创出一个地域性的循环经济体——希望形成这种经济体的可能性非常大。毛泽东所开创的解放区就属于这一形式。当然，中国共产党只有这一条可行之路呀。除此之外，无法培育游击队，但我还是对人民公社有过很高的期望值，认为那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从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今天来看，那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但是，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思想，并非从简单的想象中得出。比如，在环境问题方面，如今人们不是提出了许多诸如循环经济等说法吗？中国自古便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呀。

泽田：是“天”与“人”合二为一的“天人合一”吧。

小岛：这是董仲舒的思想。他不是战国时代或前汉时代的思想家吗？所谓“天人合一”，即一种“在鸡犬之声相闻范围内设置一个单位，这是一种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社会”。中国曾有过这样的思想。康有为所提倡的“走向自由王国”的思想不也是这样的吗？我认为，从某一意义上讲，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已经具有了探索“地域社会内部循环”的思想。

泽田：真是一个宏大的构想呀。那么，您在从事人民公社研究期间，是将之作为工作的一环进行研究的吗？

小岛：是的。作为成果，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了《亚洲经济》上。

泽田：当时，中国的学会及日本的学会反应如何？

小岛：没有任何反应。与中国的学会完全没有交流。只是从其后获得的信息获悉，当时虽处于尚不能像今天这样以电脑进行信息搜索的时代，但我所写的文章几乎中国方面都有所掌握。情报工作真是不得了呀。

泽田：是情报工作吗？您是说，中国的情报机构对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学者进行跟踪吗？

小岛：关于如何知道这一情况，因为我们结婚的媒人是一位中国人。在一桥大学里，第二外语的中文课一直由两位老师担任，一位是日本人的熊野先生，另一位则是中国人。这位中国老师姓靳。由于靳先生与日本的东亚同文书院有关系，在三反五反运动时被驱逐出中国。这位靳先生好像曾执教于东亚同文书院。当时日本规定，不允许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前来日本。但在香港居住2年或是3年后则允许入境。经过了一段时期后，熊野正平先生等人便邀请靳先生访日。熊野先生在同文书院时期曾编纂过《中日词典》。这些原版卡片返还日方后，爱知大学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后来的《中日大词典》。

泽田：是不是编写（俗称为）《熊野中文大词典》的熊野先生？现在我终于弄清楚了。

小岛：是呀。因此，他应该是在 1942 年来到日本，之后成了一桥大学的老师。在他离开同文书院后，编纂工作由铃木（择郎）接任。

1950 年前后，曾有一位女性卫生部长率红十字代表团访问日本。那时虽然尚未恢复邦交，但因使用的是红十字的名义，所以日本政府为其发放了签证。后来形成爱知大学编纂词典基础的东亚同文书院编写的辞典卡片被带到日本后，返还给了爱知大学。

泽田：是那些有名的爱知大学卡片吧。我曾经听说过。

小岛：卡片上全部盖有“完成”字样的印章。总之，中方应该全部做了备份。在这一基础上，以铃木先生为核心的爱知大学小组编纂了《中日大词典》。

熊野先生认为“本来是自己最先开始的”，于是便决心着手准备。他曾表示，“我将编写给你们看”。因此，在学习中文期间我问老师“哪本中文词典好”时，他便说，“我的辞典不久将会问世。”可是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面世。于是他便说，“暂时先用井上先生编写的吧。”我记得自己曾用过井上先生编写的三省堂词典。因为这部字典采用的是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西尔·托玛斯·弗兰西斯·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年，英国外交官，汉语语言学家，创立了威妥玛—翟理斯汉语罗马字拼音法。译注*）。熊野先生是一位非常保守的人，他对中国的简体字非常反感，包括这种拼音标记。因此，他自己创造了熊野式拼音，并收集了卡片。靳先生一直参加熊野先生的卡片制作工作，因此，在结束学校的中文授课后，他就会前往熊野先生位于原宿的家，协助熊野先生编写词典。我也曾经去过几次，但没能帮上什么忙，最多只是一张一张地帮助确认过卡片。

其后，靳先生于 1964 年的奥运会期间去世。因为我们是在 1961 年结的婚，当时，还请他作了我们的证婚人。由于是只身前来日本，他的夫人应该在中国国内，不在日本。无奈之下，结婚时，我又请了妻子曾就读的御茶水大学的中文教师中山时子作另一位证婚人。中山老师曾多次在满汉全席等各种有关中国料理的电视节目中露面，虽然已是 85、6 岁的老太太，但她的胃口显然比我好得多，十分难得呀。

泽田：中山老师曾教过您夫人吗？

小岛：是的，（妻子就读）御茶水女子大学时。靳先生去世后，发生过遗骨留存问题。困难之处就在于当时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最终对方（中方）有人前来寻问。

泽田：是其亲属吗？

小岛：不，来的是一位自称“我是居住在香港的商人，前来收取靳先生的遗骨”的人。在当时的闲聊中，他竟然一口气儿说出了许多我的著述。我意识到“啊，他是情报人员”。能够说出“你曾在哪年哪月写过这篇论文吧”的人是间谍无疑。

泽田：从某种意义上讲，遗骨只是借口，见您才是目的吧。他是情报机构的人吗？

小岛：是的，这件事是后来才完全弄清楚。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以能源研究所的理事长向坂先生为团长的10多人曾组团访华。当时，结束北京访问后去了大连。在北京期间虽然也有向导跟随，但到了大连，则换成了由大连外事办公室的人负责。由于我向中方提供的工作单位是“特殊法人亚洲经济研究所”。当我们在大连海滨散步时，这位随员便问我，“小岛先生的单位逮捕亚洲人吗？”这着实令我大吃一惊。最初没有弄明白，我想是由于上面写有“特殊”、“法人”等字样，因此有可能被认为是在从事着法律方面的工作，对方才对我进行调查的吧。虽然我们是三三两两地在大连的度假海岸上散步，我发现这位厉害的随员从前方向我走来，于是便问了我上述的事情。这是因为名单上我名字后面的“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部”中有“调查”字样呀。

泽田：那是因为您在调查研究部工作嘛。

小岛：从中华民国时期开始，“调查”便成为了“特务”的代名词啊。

泽田：不“审查”一下是不行呀。

小岛：我心里想，“啊，原来如此呀。”无奈，我只好把“特殊法人”的意思写给他看。当时，他一定了解我的著述情况。应该是大量的内容都刊登在了《参考消息》上。从那时起，与日本国内相比，反而是中国方面对我的著述更为了解呀。

泽田：这么说，您的情况都已被中方掌握，正所谓识者自知呀。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情况也没有反馈到日本呀。

小岛：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完全地反馈回来，但大概已被列入了中国的公安部门或外交部门的名单中。

泽田：这样说来，学者之间的反馈与其说是在日本国内，莫如说是与珀金斯先生等人交流的海外英语圈子？或是韩国、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了？

小岛：没有如此广泛呀。

泽田：日本国内的反馈如何？

小岛：由于1966年爆发了文革，日本报界十分震惊，于是《世界》便最早向我约了稿。

泽田：是岩波书店的《世界》吗？

小岛：正是这一杂志。我第一次为大众读者撰写文章应该是在1966年12月份吧。

泽田：是面向大众的文革论吗？

小岛：那对我来说，撰写面向普通读者的文章还是第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有很多毫无价值的内容啊。报业的特点不就是一哄而上吗？因此他们会向特定的人进行约稿。所以，我曾被亚洲经济研究所内部比喻成“乌鸦有不叫之日，但小岛却无不言之时”。不过总体说来，我也因此而出名，一时间倒像是研究伊拉克问题而出名的酒井启子。同时，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方针是，既要做好本职工作，也允许大家在外面做一些事情，以此来提升研究所的知名度。因此，亚洲经济研究所的领导层对我出名一事感到很是高兴。因此，我开始同时从事亚洲经济研究所内的研究和报界两方面的工作。在报界露脸后，就有人邀请我到大学去。就连东京外国语大学的金丸（邦三）先生也几次向我提起过。金丸先生曾劝我“来这里做正式教师吧”。我答复说，“金丸先生，实在对不住，我不想当教师”。

泽田：是这样的呀。那么，那一时期，您不但以报业和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会为中心从事研究分析工作，而且负责培养加加美先生等年轻人，您认为那时是您最忙碌的时期吗？

小岛：我真的不知自己是否真正培养了年轻人。

泽田：石原享一先生是稍后进入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吗？

小岛：石原是更晚一些时候进来的，大概是我辞职时吧。

泽田：木崎翠先生和石原先生应该是同年入所的，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吧。

小岛：嗯，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前的1981年或1982年。我离开亚洲经济研究所时是1986年，只和与他们一起工作了3年左右吧。

泽田：那么，具体而言，您一边以外部委员为核心，组织了自己的研究会并拿出成果，一边通过报界及大学在大众社会引起反响的这一时期，应该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吧。

小岛：大概是这一时期。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应该是从文革时期起，我开始对日中关系史发生了兴趣。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从1918年开始的10年间，一个叫藤原镰兄的人携妻长居北京，创办了《北京周报》杂志。

泽田：是日文版《北京周报》吗？

小岛：是的，面向常驻北京的日本人推出了这份日文版的《北京周报》。在那位老奶奶还在世的20世纪20年代，满铁调查部有一位叫伊藤武雄的人打来电话说，“你来完成上辈人未竟之事吧”。我问，“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这里收集有10年的周报，你能否根据自己的判断，编辑出一些可用于今日的东西？”《北京周报》的撰稿者只有两人，非常了不起呀。而且还是以周刊的形式出版。他希望我把这些材料编纂成书。我大量阅读了伊藤武雄先生的满铁调查部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非常之好。因此，我回复说，“好的，由我来做这项工作吧。”

我为此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虽然当时能够完成任务，可换作今天，我想自己是做不来的。里面有关于北京饭店等的情景描述。再如，由于道路还没有铺好，一到雨天便满街泥泞；北京人的家里没有厕所，早晨起床后，男男女女便分别前往公共厕所去解大手。周刊中有很多这样的情景描述，全都是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当然，也有关于鲁迅的记载，他当时已经回到中国，周作人也已回国。因此，这是非常有助于我了解（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资料呀。

泽田：《北京周报》是哪一时期出版的？

小岛：从1919年到1929年左右的10年间。真是了不起呀。

泽田：有相关的记录吧。

小岛：是的。这让我对20世纪的中国史及日中关系史产生了兴趣。再者，我认为“既然日本做了坏事，就必须尽早恢复邦交”。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我开始潜意识地向社会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认为既然日本干了如此不光彩的事情，这一点必须做到。当然，这也导致了自己在文革评价方法方面出现了失误。

在这一点上，我比不上中岛岭雄先生。中岛岭雄先生把我的名字列到了歌颂文革派里。不过，与一般的歌颂派稍有不同，在当时中国所处的形势——即处于美国和苏联之间，且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确实曾经认为，关注中国将进行哪些运动至关重要。同时，中国不是一定要越南进行援助的吗？我认为，从这种困境中所进行的运动方面对文革进行积极评价将会有所收获。我全然不知曾经发生过大规模迫害行动。偶尔也有过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听说过有尸体漂到香港或澳门之类的事情。现在看来，真是很残酷呀。对于国内的动乱和战争，我当时一概不知。从加加美所著的《镜中的日本与中国》这本书中，我认为他在颂扬文革方面出现了错误，具体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错误”。

泽田：此前，我曾听中岛先生讲，他在研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时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属于民主革命。您在这一方面是否有所忽视了呢？

小岛：是的。这正是我的失误之处。具体而言，我没有从理论方面进行研究。

泽田：话虽如此，欧美对当时的日本社会科学的影响非常之大呀。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自不待言，韦伯（Max Weber）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人也曾对当时的中国研究产生过影响吧。您自己曾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小岛：影响倒是没有，因为范围非常狭小。

泽田：这样说来，当时的情况是，欧美的中国研究和日本的中国研究是完全孤立的，双方之间没有开展过交流吗？

小岛：曾有过一些。如前面所提到的市古先生以及石川滋先生等曾借鉴过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等人的思想，在宏观分析方面采用了与欧美

同样的方法。村松祐二先生也是如此。村松先生去世于 1970 年前后的大学动乱中。曾有过类似的交流。但是，整个日本的中国研究并非如此。你也听说过亚洲经济研究所遭到拒绝的事情吧？

泽田：遭拒是指？

小岛：为了解日本各大学及主要研究所保存有哪些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打造资料共享平台，亚洲经济研究所图书资料部拟定了这项计划。我们不是收藏有日本殖民地政府刊物所藏目录这一大项目的 7 卷吗？所谓亚洲经济研究遭拒，是指在推进这一大型项目之时，一些研究机关和大学拒绝提供相关的资料信息。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拒绝了该项计划，认为“亚洲经济研究所是右翼帮派”。亚洲经济研究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无法与这些人进行交流，当时双方的关系非常紧张呀。后来，随着这种氛围的消失，约 3 卷的补充卷得以重新编纂。

泽田：是吗，原来是这样呀。

小岛：这就是当时日本的学会的氛围。当然，在没有与中国进行交流的情况下，完全是由几个人以私人方式与中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保持着联系。

泽田：艾克斯坦（Eckstein Alexander）也是其中之一吗？

小岛：是的。在经济领域，艾克斯坦与石川滋先生有过联系。

泽田：原来如此。那么，您大连之行是首次直接前往中国并与对方的学者开展交流活动的吗？

小岛：不，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 1973 年，是为期 1 个月的旅行。那次是安藤彦太郎先生邀请了大批新左翼人士并带他们前往中国的。只是那次只是四处看看而已，并没有另行组织交流活动。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宇井纯先生也曾同行，他是让水俣病判决获胜的人员之一，于去年 11 月去世。

泽田：这么说来，您在这一时期也参加了水俣病的调查吗？

小岛：调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总之共持续了 5 年。当时色川大吉在筑摩书房（注：日本出版社名）出版了《水俣的启示》上下卷。我是从那一时期开始研究环境问题的，“那一时期”究竟是哪一年，查看一下这部书就会清楚了。

泽田：翻阅色川先生的《水俣的启示》就会清楚吗？

小岛：是的。因此，我总觉得自己很关心这一问题。在中国旅行期间，宇井纯先生曾多次应邀作了讲演呢。1973 年 3 月访华期间，十几名团员曾按课题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小组，我一直和宇井纯先生在同一小组。在此之前，我记得曾针对环境问题为《亚洲经济》等杂志撰写过论文。

泽田：论文的内容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日本的环境问题吗？

小岛：不，是有关中国的资源综合利用方面。这一资源综合利用运动最早出现在1959年。大跃进运动也属于此类。例如，把存留在院子里几十年、几百年的鸡鸭粪便翻出来，或利用沟渠的烂泥当作肥料。以这些事情为开端，曾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利用野草，用工厂的废铁、木屑等生产产品的运动。我对这些很感兴趣，大概自己是对资源的彻底利用比较关心吧。另外一个我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植树造林。我从图片中了解到中国荒山居多，所以自己很早便开始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我想，大概是因为自己出身农民，曾有过山村生活经历，才对这些问题更关心吧。我从早些时候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革之前就开始了这一方面的研究。

泽田：那么，您最早研究环境问题是从小岛之前开始的吗？

小岛：是的。谈到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源于自己的农村成长经历。

泽田：您最初访问中国时，是由安藤彦太郎先生率团，团员中有审理水俣病的宇井先生等，为期1个月。第二次访华是前面提到的那次吗？

小岛：是前面提到的1979年与向坂先生一道访华那次。

泽田：您之后常去中国访问吗？

小岛：当时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即如今的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接受台湾“光华基金”的资金后，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其前身是经济系经营专业，厉以宁先生任院长。我接受该系向我发出“希望能够前来任客座教授”的邀请后，于1989年前往中国，开始在其研究生院任课。

泽田：那是在您调入大东文化大学之后吗？

小岛：是的。因为调入大东文化大学是在1986年前后。

泽田：那么，从1989年开始，您是每年都接受邀请前往中国的吗？

小岛：是的，曾多次前去北京大学。不过到了9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该学院，由留美回国教师任教的计量经济学成为主流。这是我力所不及的领域，因此，从那一时期开始，我便没再前往。最初的授课是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前的3月份。

泽田：，那么，您前往北京大学之后，实现了与中国学会的交流，开展过合作研究吗？

小岛：没有进行过什么合作研究。合作只有一次，是有关环境意识的调查项目。

泽田：是与大冢健司先生一起做过的那次调查吗？

小岛：是的。那是 1987 年或是 1988 年的时候。

泽田：也有可能是在此之后。我在香港期间（1989—1991 年），藤崎成昭先生曾吩咐我写过一篇稿子，因此说不定是在 1989 年吧。

小岛：是的。我曾经做过这项工作，算是一种合作研究吧。亚洲经济研究所也曾邀请过对方（中国）的两个人。

泽田：如今，据说亚洲经济研究所正在培养国际化的研究人才，我们学校也曾有过同样的表述，都在强调“在国外发表论文，并刊登在有严格审评制度的专业杂志上”。因此，在这种形势下，比如携带经费前往中国，在当地进行调查后，以英语形式发表论文等，这种案例在不断增多。对此，从自身的角度看，您认为好处表现在哪些方面，哪些方面“应该引起注意”呢？能否提出一些建议呢？

小岛：要当心的是“钱财被侵吞”。

泽田：是这样呀。您认为“钱财有可能被侵吞”？

小岛：亚洲经济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呀。虽然亚洲经济研究所会要求“以 70 万日元或 80 万日元，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某个项目”，但这样是无法开展交流的，因为对方也在期盼着这些资金。这应该是最可怕的事情吧。

泽田：具体而言，应该说是转包形式，即投出全部资金交由对方承办，资金由当地的研究人员使用，只收取成果的形式。

小岛：是的。例如，中方已经接受国家的委托在实施多项调查时，如果只委托其做某项调查，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相应的费用。而且，在我从事研究工作期间，对方（中国）还不允许开展合作研究。我做过的最大规模的合作研究是世界银行调查项目。

泽田：是这样的呀。

小岛：这一项目从 2003 年至 2006 年，加上延长的半年，共历时 3 年半。具体而言，这一项目是体制改革委员会——即过去的计划委员会向世界银行提出申请，“人口全部涌入大城市将带来一些问题，希望使之流向小城市。请就此类政策是否可行进行论证”。这是中方向世界银行提出的申请。于是世界银行设立了项目研究小组。我在亚洲经济研究所期间曾出版过英文著作《*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oblems in China*》（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问题），世界银行似乎对这一情况有所掌握，因此我被吸纳进该小组。参加这一项目的是几名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的海外学者，再有就是 4 名中国本土的学者，他们都来自自然地理研究所。项目组成员之间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虽然世行为该项目提供了相当于亚洲经济研究所 10 倍左右的巨额资金，但仍然没能开展起真正的合作研究。中方的 4 名成员中男性两人，女性两人，每人都操着流利的英语。他们有的是在香港取得的博士学位，有的曾多年留学法国，还有的是留美回国人员。由于他们都有海外生活

经历，所以语言方面我吃苦不少。由于是实地考察，所以我在一个月中都没能使用日语。但我认为，仍不能称之为合作研究。具体而言，世行该项目的负责人是来自韩国的世行职员，就像石川滋先生一样，他为我们分配了工作。由于小组成员都是国际学者，所以是不能说“你的论文不行”之类的话的。前年10月，我刚认为自己已经从这一世行项目中解放出来，不想却又接到了委托。而这一委托刚一完成，下一个委托却又不期而至！这项委托我一直做到了去年的5月份。这可是我用英语撰写呀，全是一些“It is that, therefore…”之类的内容。我对这一项目已经感到厌倦。我十分痛恨自己的英语为什么如此的不好。但结果是，所谓的合作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常常是乱反射性的，有的主题偏向这一方，有的则转向另一方，虽然7、8篇论文合在一起，会构成一项研究成果——归纳成一个统一的主题通常是很难的。4名参加该世行项目的中国人中，提交出能够发表的论文的好像只有两人呀。美国也有几名学者参加，其中的华裔美国人能够直接前往中国进行采访，这非常理想。但是，完全不能阅读中文文献的白种人学者甚至连中国的现状也不了解——这样的人大概有两位吧。这一项目要求每年做1个月左右的调查。因为有世行的背景，该项目具有巨大的权威性。由于想从世行拿到钱，中方提供了最高级别的款待。因此，所到之处，都会有多名负责人出面，表示“可以问任何问题”，甚至到城镇也会听到这样的话。这只是情况的一部分，仅此是不能构成合作研究呀。因此，只是将听到的情况进行整理，转换成文字而已。但我认为加加美所从事的COE则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曾送过我一摞很厚的成果。

【第三部分】

小岛：由于美国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所以历史较短。因此，谈到这个国家的小城市建设是怎样一种情况时，它在背景方面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主张“鉴于中国正在高速发展，应该将之与具有高速增长经验、拥有过剩农村人口的东亚各国进行比较”，并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现今的中国进行了比较。我以“针对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高速增长带来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少于10万至15万人的城市是否取得了发展问题，其回答是否定的”为基本论点撰写论文，得出了“中国即使制定出这种政策，也将无法实施”的判断。中国的学者即便留过学，对国外的情况有所了解，也会因为有国务院的方向性政策而无力从中摆脱出来呀。从他们的文章分析，这种情况不是明摆着的吗？1982年，国务院的“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方针出台。作为国务院的方针，这一政策一直没有取消。但是，事态的发展却与国务院的政策背道而驰。对此，虽然中国的学者在讨论时也会这样说，当我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把这一情况写在论文里”时，事实上他们却谁也不去这样写。再有，中国的学者常说“土地少”，对此我曾反驳说，“那为何还一直在修单向三车道的道路呢？”“有多少车在行驶？这样做是否划算？算算看吧。”我们认为，一定会有某些方面在付出牺牲。但是，即便提出来，他们也还是不会写出来。这个问题很难呀。因此只能对自己说，“只要他们能够明白其中的差距就够了”。从表面看，合作研究具有很大的魅力，但实际中则困难重重。如果调查活动的负责人不能下达独断性指令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呀。我以前曾利用科研经费，进行过有关中国的教育、环境的合作研究。当时曾围绕着是否不采用中方学者提交的论文而踌躇再三。对方（中方学者）如果不能适应这些条件——最好是像石川先生那样，从一开始便分配好

工作，全部确认好“内容不合格将不予采用”后再启动项目。否则，将会显得失礼，招致误解。所以说，合作研究很难呀。如此一来，就会出现像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普通研究会著作那样，将主题不统一的论文罗列在一本书中的结果。因此我认为，研究会的负责人必须是“独裁者”。

泽田：不仅亚洲经济研究所，所有地方都是这样的吗？

小岛：我觉得哪里都一样呀。

泽田：您是说负责人非常重要？

小岛：是这样的。这样说更顺耳些吧。

泽田：您的意思是说，即使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调查负责人也必须那样做吗？

小岛：正是这样。

泽田：由于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中无法规避原则性问题，现在人们就日中关系议论最多的是民间渠道的交流和学术方面的交流。您认为即便如此，也不应该规避原则性问题吗？

小岛：不。与国家之间或政府之间相比，其原则性程度会较低，同时也会进行“不能写”或“不写”范围内的交流。最近这一形式的交流正在不断出现。重视这种趋势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泽田：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关您的私人问题。您有过通过同中国的朋友或亲戚等人的交往，了解中国的经历吗？亲戚这一说法或许有些不恰当，这里是指非学术性的正式交流，在私人交往中与中国人建立较好的关系。如果有这样的经历，请您讲一讲从他们那里了解的情况。

小岛：我有 2、3 位这样的朋友，他们当中既有我在学生时期以及研究生时期留学而结识的朋友，也有双方都已步入社会，同为研究者而交往的朋友，不过，后者当然会有一定的限度。谈到从年纪较小的学生时期或研究生时期开始交往，如今不是出现了很多新的方式吗？

泽田：如今的年轻人是否能够进行这种交流呢？

小岛：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就我而言，从没在中国长期居住过。今年 5 月，我第一次连续 3 周住在中国同一个地方，因为有北京外语大学的授课，在北京，第一次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住了 3 个星期。如果能够以这种形式进行交往，或是能够利用一周的时间，以召开会议为主要形式，邀请中方学者并与之进行交流，那么交流的内容自然就会有所不同。关键还是应该从年轻时期开始互相交往呀。还有一种形式，那便是能够与前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建立起师生关系。这将自然地带来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些现象不是正在日渐增多吗？因此，我对年轻

人的这些形式的交流抱有期望。

泽田：您是说，利用年轻时的留学机会结交朋友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小岛：是的。这样做不是最有意义吗？

泽田：那么，谈到您的研究成果的发表，我认为主要有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出版物、报纸上的文章以及面向普通市民的公开讲座等多种形式。这些成果形式中，您有过“这一成果超乎想象的好”、“研究深度超过预期”，或完全相反的“这一成果有些浪费时间”之类的想法吗？

小岛：总体说来，没有亚洲经济研究所，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呀。亚洲经济研究所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便开始派遣研究员前往日本国内各地进行演讲，费用由研究所承担。恐怕派遣人次最多的就算我们这一代了。其中，我算是出差最多的人之一吧。

泽田：您是指国内出差吗？

小岛：是的，我曾去过冲绳、札幌、金泽等地。由于人们对中国的关心度很高，所以讲演邀请便从各地纷沓至来。来了邀请函，亚洲经济研究所领导们便对我说“你去吧”。因为出差总会安排给那些饶舌之徒。

泽田：是参加各地的演讲会吗？

小岛：是的。今天的人们简直难以想象，邦交的正常化带来了频繁的交流。但是，即便是在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人实现访华也还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大概是 1983 年或 1984 年前后开始的吧。因此，用偏颇一些的话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30 多年间，交流一直处于中断状态。因此，日本的市民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作为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而外出演讲，例如去金泽时，自己却不知听众是一些怎样的人。因此，自己需要对金泽地区的状况进行了解，因为不知道他们会提出一些怎样的问题来。他们了解文革、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吵架以及周恩来是如何像慈母一样以温情关怀民众的一些事情。了解这些事情的人，具体而言，鱼店的大叔、药店（的店主）等，他们的兴趣点会各不相同呀。我是如何应对这些情况的呢？我会在讲演的前一天赶到当地，首先到报社找来地方的报纸。由于各县的县城都有报社，我便去那里找来剩余的报纸，花一晚的时间阅读。并在讲演当天上午，退掉饭店客房后，叫上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这是一万日元的车费，带我浏览一下市容。”这样说了之后，出租车司机就会问我：“跑一万日元的车程？把您放在哪里好呢？”我回答说：“最后，当费用快到一万日元时，把我放在市政府门前下车。”当时，花一万日元打车，会坐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司机对市场情况最为了解，我便问了他许多问题。比如现在酒馆很繁荣或最近酒馆人气不旺等，我询问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把出租司机当做了受访者。最终，当 11 点半左右来到到市政府附近时我下了车，并跑进政府办公楼。那里有供市民阅读的简易宣传册，其中记录该市有多少人口、男性与女性各有多少人等信息。我马上拿过来阅读。由于主办方大都会提供午餐，我便根据地方报

纸的（报道）、出租司机的答话以及从宣传册中了解的信息，向招待我的人进行印证。这样一来，我就能够把握来听讲演的人们关心哪些事情等相关情况。于是，战前准备结束。这一方法非常行之有效，能够从中了解当今的日本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厌华派的比例正在大幅增加等情况。

泽田：您说的是“讨厌中国的人”吧。

小岛：是的。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有人开始认为“必须在日中问题上想些办法”，“不尽快恢复邦交正常化，我们的下一代也将会处于与中国对立的状态”。在国内出差时，我感受到了这种氛围。因此，在亚洲经济研究所时，被派往各地讲演或应邀前去讲演，这对我的感性历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呀。这是最便宜的方法，即使花了一万日元的出租车费。

泽田：那是您自己掏腰包吗？

小岛：当然是自己掏腰包啦。

泽田：亚洲经济研究所不给费用呀。

小岛：是的。

泽田：感性的东西，不是书本里能够学到的呀。

小岛：总而言之，是“获取资料”。所谓的资料，不仅是文字，也不单是统计表，人们口传的内容也属于资料呀。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环境。现在大概行不通了。

泽田：现在怎么行不通了呢？

小岛：因为普通人会认为我是中国研究专家，业已成名，是专家。了解了这些情况，他们就不再对我坦率地讲出有关中国的看法了。去年 7 月末前后，小学初中教员夏季研修会在我的家乡召开。我的几位朋友，包括在那次研究会召开的前一天见到的小学时代的朋友们几乎都对我不怎么感兴趣。但是，由于他们是我小学时代或左邻右舍的朋友，既不对我另眼相看，也了解我过去的情况，甚至还认为我是那个流着鼻涕泡的孩子，所以他们向我讲了一些不容乐观的情况。到场的人当中，90%以上表示“讨厌中国”。“厌华派”比例如此之高，甚至令我感到了一些不愉快。

泽田：表示讨厌中国的人占到了 9 成吗？

小岛：是的。

泽田：最近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氛呀。

小岛：厌华派的气势很是强大呀。我觉得这里的朋友们也会是这样想的。今年9月，阿部纯一先生（财团法人霞山会首席研究员）从中国回来之后，霞山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表示希望我能够出席。日方的主讲人中有冈部达味先生、小岛朋之先生、北朝鲜问题研究专家伊豆见原先生和我。在那次会议上，我回应说“您对此虽然说得轻描淡写，但在过去的10年里，日本存在着两个有关中国的问题”。我指出，一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出现过必须设法解决日中两国之间问题的氛围。您虽然提到日本的普通“百姓”（普通市民）对中国表示出关心，但如今已然变冷。关于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既取决于贵方（中国），也取决于日本。

另一个是农业问题。日本的农业问题表现在农协成为执行FTA（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的最大障碍。日本的农业政策属于政治问题，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农业政策。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向农户提供补助金。因此，如果遵守WTO的原则，日本政权有可能会垮台。民主党现在推行的农民补助金政策方案等没有意义，因为这样做将与WTO原则相抵触。

而从另一方面看，贵国（中国）则完全相反，再没有哪个国家如此剥削农民。2002年不是推出了“早期收获协议”（Early Harvest）政策的吗？

泽田：是的，曾出台“早期收获协议”政策。（中国）也因此得以迅速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小岛：是的。这属于国际分类中的第1类到第8类。

泽田：是的，这属于“协调制度”（HS, Harmonized System）类吧。

小岛：是的。根据这一协议，关税不是会不断下调的吗？希望它能够成为自由化的突破口。之前，在我进行日中经济协会的农业调查时听说，“早期收获协议”决定签署之际，中国农业部表示，虽然“我们一直反对”，但“商务部却强行这样做”。这种表述很少见呀。当时我对热带农业研究所的所长说，“我认为，从自然地条件看，贵国（中国）的热带农产品在与东南亚的竞争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从地理等方面考虑也是不利的。即使从气候和降雨量等因素方面考虑，也注定将受到打击。中国为受打击的农民提供保障吗？”这位所长表示，“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不是WTO的精神吗？”我反唇相讥，“你们简直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呀！”

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于是我便在9月的霞山会会议上以此为例指出，“中国与安倍（前首相）就FTA（自由贸易协定）、战略性共存关系以及共生关系等签署文件，令人觉得两国关系正在回暖。但实际上，包括重庆足球赛（亚洲杯期间的反日活动）在内，贵国不也存在着反日情绪问题吗？”“还有一点，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国人实在太坏，这也是导致厌华情绪的原因之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改变了日本迄今为止的犯罪性质。在这类事件导致的对华好感的降低，是不可能短期内悄然发生任何变化呀。”我这样说完之后建议说，“基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今后就让我们共同探讨对策吧。”

泽田：那么，中方对此反应如何呢？

小岛：因为中方参会的单位是中联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针对恰好在这一期间发生了“箱装馒头事件”，日本人的对华感情变得非常恶劣的现状，他们也只是作了官方性发言。“关于小岛先生的发言，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中方的一人这样说。“不应只对一些情况进行夸大宣传。我们正在认真地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国家过于庞大，没有能够顾及这些情况而已。”他如此解释说。于是，我甚至想说，“那是贵国的管理能力下降了呀！”但考虑到这些是不能说的事情，还是选择了沉默。

泽田：原来如此。

小岛：总之，即便是实际存在的事情，像我这样上了年纪且不顾脸面的人，也是难以在有数名公职人员参加的正式会议上随心所欲地开口呀。能够说的仅此而已。

泽田：听负责编辑霞山会《东亚》的阿部纯一先生说，他与小岛先生一道参加会议时曾吃惊得险些喊出声来。据阿部先生讲，中方曾表示，“对中国而言，日本已经不再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虽然阿部先生没有向我更详细地讲述过，但据说中方曾提到“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最大贸易伙伴，但对中国而言，日本已然不再是了”。因此可以概括地说，阿部先生认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不要再神气了”。他曾谈到，“当时，由于小岛先生给予了精彩的回敬，我感到心情非常畅快。”当时您是如何回敬的，能讲一下吗？

小岛：那件事已经忘记了。关于日中关系，从胡耀邦时代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各种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曾经不可或缺。例如，在贸易方面，30% 为对日贸易。至于中国接受的 ODA（政府开发援助），其总额的 70% 来自日本。而且，全部的 ODA 不是都汇总到了中央政府，没有流向地方政府吗？因此，日本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今，日方的这一比例一直在减少。中国各地都出现了日本被取而代之的情况。日本必须对这一情况进行研究。我认为这种情况的背后是有原因的。另外，1994 年实施的江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也有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是民族主义。关于这一点，我想自己在那次会议上并没有讲出来，那便是“贵国（中国）不是无论如何都想成为世界第一，不成为世界第一便绝不不甘心的吗”。譬如，由“森大厦公司”承建的浦东高层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这一建筑曾中途出现过变更呀。当台北的 101 大厦成为全球第一高度后，中国要求对浦东的大厦设计进行变更。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呢？这座大厦如此，在其他任何事情上也都想成为全球第一。我认为本届奥运会也是同出一辙，中国变成了一个不成为全球第一便绝不不甘心的国家。

泽田：是一种新型大国意识呀。

小岛：完全是大国意识。

泽田：这并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各种优势性。

小岛：的确不是呀。

泽田：是不是到了在物理上达不到第一就誓不罢休的地步？

小岛：正是这样。想成为物理上的第一。中国引以为豪的位居全球第一的产品一览表有很多，目前已超过 200 个品种。

泽田：这证明其具有全球第一的生产力呀。

小岛：是的。中国生产的计算机占全球总量的 75% 以上。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说的是需要剥开计算机的外壳计算。其中大部分的内部零件不都是台湾企业的产品吗？

泽田：的确，台湾产的主板居多。

小岛：是的，正是台湾的产品。而且，在计算机生产领域，主板产值最大的国家却是日本呀。

泽田：原来如此。而且，生产 CPU 的是美国。

小岛：是的。在机器里面根本见不到中国产品。中国的粗钢占全球产量的 4 成，但其中能够用于汽车生产的则为零。因此，用于汽车生产的粗钢是日本在源源不断地出口到中国。

泽田：也就是说，中国生产汽车用的钢板也都是由日本进口的呀。

小岛：所以，中国虽然对在华生产的产品产量达到第一感到高兴，但实际情况却是“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出入”。我本来想说，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不同产业的情况，最终没有说出来。

泽田：的确，我也曾听过这些情况，而且自己也在授课中讲过，虽然中国的产量全球第一的品种很多，但在寻找中国全球第一的企业时，无论是电视机企业还是其他家电企业，都不见踪影。如今，中国正计划打造自有品牌。

下面换一个话题。我发现，改革开放之后，日本年轻学者一直以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向日本学习”的思维方式开展研究。如果说，在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有人认为中国是“不同体制国家”的话，我觉得小岛先生就是这样一代人，同时也是后来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代人。今后，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人会越来越少。从现状看，中国可分为发展中国家性质的地区和全球生产基地地区两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未来的中国研究时，日本的学者应该持有怎样的观点呢？

小岛：关于这些嘛，实在抱歉，我也不是很清楚呀。

泽田：那么，如果请您提出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是抽象的——请您谈谈，自

己希望日本的学者或全球的学者应该如何开展中国研究呢？

小岛：首先是高速增长的观点。但高速增长的世界记录保持者却是台湾和韩国。

泽田：与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相比，台湾和韩国的速度更快吗？

小岛：嗯，具体而言，判断是否属于高速增长，其基准之一便是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中国的这一数字大体在 9% 前后，日本为 9.3% 左右。另一个判断指标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年数。

泽田：是指经济发展的持续年数吧。

小岛：从经济持续发展的年数看，日本为 18 年，台湾和韩国是 40 年。在 20 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经济发展史中，日本更新了增长持续年数的记录，但不久便被台湾和韩国所打破。谈到中国的高速增长开始于何时，1979 年以后开始计算合理。此前的起伏变化过于剧烈。1979 年以后，1989 年和 1990 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并未出现负增长。今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 28 个年头。其间的平均增长率大体为 9%。在年数方面，中国是否能超韩国和台湾是看点之一。我认为不会超过。

迄今为止，我所了解的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中，最乐观的便是基金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高盛预测，中国的总 GDP 将在 2015 年前后、印度将在 2020 年前后分别超过日本。这是最为乐观的预测。但我认为这不会变成现实。

那么，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便是自 2023 年起，中国的绝对人口将开始减少。日本的绝对人口是从去年开始减少的。人口减少的国家将不可能保持 9% 的经济增长率。因此，我认为，到绝对人口呈现零增长的 2023 年时，中国经济将会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再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老龄化，即“空宅老人”问题。这在日本被称为独居老人问题。再过 10 年，中国的这一水准将会与目前的日本相当，最终将出现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地相对减少。接下来自然会带来年轻劳动阶层工资的提高——这一现象已经开始出现。蓝领的工资在 20 年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种情况本身就很奇怪。如果出现高速增长，物价上涨，地价上涨，然后便是工资的提高。这在日本、韩国以及台湾都有过相同的经历。然而，中国因为拥有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没有看到工资的提高。如今，1980 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他们的工资每年都在提高，这种情况不久将会波及到上一代人。迄今为止的工资提高，只表现在“专家”，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阶层。接下来是服务业，其中在房地产、金融等新兴产业领域，工资不断大幅提升。然而，整体工资并没有得到提高。大约从 3 年前开始，整体工资开始迅速上行，与之相伴的则是国际竞争力的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社会层面保证 2015 或 2016 年大量出现的高龄者的生活，这一问题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

如果将同样的问题与日本进行比较的话，目前尚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福祉发达程度能够超于日本，（这一问题）即便在日本也成为了较大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将会如何应对呢？虽然听说从去年开始，（中国）在为农民工上一些失业保险或灾害补偿保险，终于到了这一步。据称浙江省等地的合作医疗开展得很好，但由于没有政府的财政拨款，只是他们在自掏腰包，因此不可能持续下去。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在北方及西部地区，缺水将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一问题上，如果不从现在起不为投保，不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和实际准备，届时将会措手不及。然而，中国政府只是对发射航天飞机、取得多少块金牌之类的事情感兴趣。这与攀比大厦的高度一样，不太正常呀。

泽田：谈到金牌、大厦的高度及宇宙开发竞赛，有些像当年的美国呀。这样一来，是否也会在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方面，出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为方便的做法是在这种自由竞争中只保证最低限度。

小岛：不是连最低限度也难以保证吗？

泽田：这是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呀。

小岛：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导致了每个家庭的孩子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了吗？中国的农民来到上海等大都市后，就不再返回家乡。我认为，我们每家都有二、三个孩子，这比较理想。关于老龄化问题，我现今居住的山梨县也深有体会。我家所在的住宅区内有 55 户人家，被划分为四部分，我家靠近山体，在最后，这一部分有 15 户人家。在这 15 户中，有 7 户是 70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独居家庭。

泽田：占到了一半呀。

小岛：是的，占到了一半呀。即使是距东京的新宿仅有 2 小时电车车程的地方，也是这样的情况呀。如今，这一问题正在中国出现，所以形势非常严峻。此外还有性别失调问题。能实行一妻多夫制吗？如今，中国 20 岁以下的男女比为 100:120，而性别的自然比为 100:105~106。因此，中国必须大量“进口”女性。在南方的傣族等地区，已经开始了“进口”。

哦，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开发学校里不是有一位 30 岁前后的女性吗？

泽田：是来自中国吗？

小岛：是的，每年都会有一名中国留学生来开发学校。我在开发学校作有关东亚人口问题的讲座时曾问她：“能不能实行一妻多夫制？”她回答说，“在现代社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夫多妻制，但这在现代却是难以实现，更何况是一妻多夫制，这无疑会更加困难。这一问题将如何解决？中国在着手做应对这一问题的准备了吗？有关这类问题简直不胜枚举呀。

泽田：关于中国正面临人口的最基本性风险问题，如果从狭义角度看，一旦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形势是否会逆转。

小岛：不会出现逆转。

泽田：您认为从发展的特点看，这与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关系吗？

小岛：不是的。我认为，虽然在劳动力性别方面，与日本相比，中国女性参与社

会活动的机会更多一些，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将难以实现。因为在这二十多年里，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这一想法很难实现呀。人是无法同时兼做两件事情的呀。既要养育子女，操持家务，又要与男性一样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呀。

泽田：在中国，迄今为止，这一问题是通过雇佣“保姆”或家政女佣来解决的。据说，这些家政女佣的工资已经上涨了许多。同时，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家政女佣往往不会持久，由于他们到了一个家庭，做过一年以后，就会对城市生活一清二楚，于是就会去转做其他的工作。据在御茶水女子大学从事性别研究的研究人员讲，女性的家务负担也因此在不断增大，不能“一直认为会有便宜的农村劳动力”。

小岛：中国存在着无限多的问题呀。

泽田：接下来是一个要求我“一定要问”的问题。您在对自己进行评价时，认为前面所谈到的自己业绩中最大的是哪一个？反过来，自己认为最遗憾、最后悔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小岛：首先来谈谈第二个问题。记得从前曾有一个叫橘朴的人，他是一位汉学大家。那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据说他的汉语行文甚至比中国大学教师还好。他留下一句名言。20 世纪 20 年代，军阀群起，出现了合纵连横的局面——日本有关中国形势的预测是不准确的。他对此进行讽刺，并说过一句“中国通及其遮羞布在进行预测之前已然错位”的名言，意思是说，“在开始进行预测之前，中国通的预测和他们的遮羞布已然错位。”他用这句话指出“中国通迄今的推论是错误的”。

泽田：是指“在军阀等动荡时期，中国通们的推测不正确”吗？

小岛：是的，是指推断的错误。如“人民公社是以这样的形式失败的”等，在尚未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之前，是不能为“走向失败”的原因作出诠释的。后来发生了文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会出现与党和政府对抗的事态呢？我认为，这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发起的。从中国人的口中得知，曾有过很多腐败和反腐败的斗争。而且，为争权夺利便导致如此规模的相互残杀，这一点是我始料不及的。

再者，当进入邓小平时代后，我认为中国有可能会出现外汇准备金不足的情况，并在这一方面陷入困境。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外汇不足问题，现在反而出现了号称全球外汇储备第一的现状。因此，我的推断不断落空。为什么自己如此看不透中国呢？对此，我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责心理。

泽田：但是，当时预测中国将陷入外汇不足困境的并不止您一个人，很多其他研究者不也是这样预测的吗？我在研究开发问题时发现，当时有关中国的债务偿还能力比率（Debt Service Ratio）不乐观的判断非常容易理解。从另一角度看，是否可以认为，无法预测出其出口能力会如此迅速膨胀？

小岛：嗯。总之，在开发经济学里，前面曾提到的瓶颈问题，首先表现为商品粮问题，其次便是外汇。

泽田：是商品粮和外汇吗？

小岛：是的。这些问题有可能转化成最重要的瓶颈。中国也确实因此遇到过这些瓶颈。而且，由于中国的独立自主观念非常强烈，之前一直实行的是进口范围不超越出口范围的原则。这一原则最终在华国锋时期退出舞台。于是，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时认为，其累计债务将会步拉美的后尘，但这一预测也以彻底失败告终。至此，我的预测全部落空。如果今天再用橘朴的话来说——虽然已经不再有系遮盖布的人——就会变成“中国通及其遮盖布在进行预测之前已然错位”。预测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关于加加美最近出版的书嘛，今晚必须完成并提交这本著作的书评，但非常难以下笔，因为这部著作谈的是有关为何中国研究会出现如此多的预测错误的内容。

泽田：这正是加加美先生的风格呀。

小岛：加加美在书中指出，这是因为在方法论上出现错误。因此，加加美表示，“我用的是这样的方法。”就是这本书（手指该书），《镜像中的日本与中国》。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为何副标题是《中国学与共同行动论的观点》，他认为应用这一理论，便可避免方法论上的错误。我想在书评的最后写上一行“加加美，希望你能以自己在这里写下的方法论检验一下自己此前所撰写的著作”之类的文字。

泽田：是这样呀。接下来，我想利用自己采访者的特权，向您提出一个自己希望了解的问题。我认为，“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这一构想曾是亚洲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方向。但是，在这一构想中，当中国的环境发生诸多变化时，区域研究的定位是否也会随之变化呢？过去由于很难前去中国，所以也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些人只因从亚洲经济研究所申请到经费后去过中国，于是便小有名气了。

这也同样适用于像我们 40 多岁这一辈人。记得当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大原（盛树）先生提出“海尔（Haier）公司在中国生产出了自己的空调，其产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时，日本人曾感到非常惊讶。这件事不知不觉已过去了 10 年。如今，谈到海尔，常驻海外的人都很了解。仅就信息量而言，我们绝对比不上有着 10 年海外生活经历的民间人士，只是他们没有发表信息的平台。我认为我们研究人员应该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发表出来，传递给社会，为对方作出贡献。与此相关，最近，拥有与中国紧密联系渠道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开始了在日本的研究。虽然有政治方面的束缚，但他们一旦在日本安下身来，其束缚的程度要远小于在中国国内。

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人在日本国内开展中国研究，还必须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但是，此类研究，即以欧美流派的方法剖析中国，无论开展怎样的研究，方法都会相同，进而难免出现千人一面的情况。概括地讲，在保持理论与调查均衡的前提下，重新塑造区域研究的风格方面，您认为应该走怎样的路呢？

小岛：加加美的著作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出现了“中国学”这一词汇，。

泽田：是“中国学”吗？

小岛：是的。如今“中国学”这一词汇的出现频率非常高。但是，我们的词汇里有“印度学”、“印度尼西亚学”、“美国学”、“英国学”吗？不是没有吗？因此，使用“中国学”这一词汇，并让人理解其含义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是一个创造了巨大的文明和极高水准的文化之国。因此，法国出现了“汉学（Sinology）”，日本出现了“日本汉学”和“支那学”。这是因为中国及其文明程度巨大。然而，现在的研究是抛开这些内容。于是，金融专家从自身的金融理论角度观察中国并能够开展较好的研究。像我们这样对金融一无所知的人，虽说懂中文，但若分析专业之外的金融领域问题，就写不出文章了。

在进入这一时代的过程中，或许会出现“美国研究”，但它却不太可能被冠以“美国学”。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只有通过众多领域的理论、观点、专业加以印证的方法才能够把握其内容的时代。换言之，虽然经济学中也会包含有财政学以及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人口学等内容，但我们只能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进行观察。我认为应该借用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其专业领域所创立的理论加以印证，这是唯一的道路。

这既可以是美国创立的理论，也可以是英国创立的理论。或许还会有人独自创立理论。但在研究者中，能够独立创造理论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一，其他的人只能点头称是。

泽田：只有不断学习呀。

小岛：只有这一条路呀。而且，即便是掌握了对象国语言，其语言的重要性也被前来日本的留学生冲掉了。因此，我们正在迎来此前所说的“支那学”、“日本汉学”、“现代中国学”以及“中国研究”等称谓将不再适用于中国的时期。实际上，如日本专门研究水资源问题的人对中国的水资源问题进行彻底剖析的话，那么把握真实的几率就会很大。这难道不是最为重要的吗？尼达姆曾向我讲过有趣的话。

泽田：是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吗？

小岛：嗯，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我曾开玩笑地问他：“您的家境不是很好吧。因为你的名字叫“need ham”，是连火腿也吃不上吗？”他则回答说：“呵呵，你猜得没错儿，正是这样呀。”

泽田：是真的吗？

小岛：由于当时是在天麸罗饭馆就餐，他或许是为给我面子才那样说的吧。尼达姆先生曾研究过 17 世纪前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他表示，“在 17 世纪前的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国为何能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这是我希望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关于第二点，他表示，“曾经拥有过如此高水准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何没能开创出现代科学？这将是我的第二个研究课题。”他还说，或许自己只能做完第一个课题，因为自己余年有限。结果，他的研究果真在完成第一个课题后便结束了。

接下来关于第三个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努力引进现代科学

技术。但是，当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现代科技发展速度趋缓时，中国是否能够超越这些发达国家？尼达姆先生曾表示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局面。我问：“多少年后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回答说：“还不清楚，希望自己能够看得到。”

换言之，因为前面谈到的尼达姆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科学技术，所以便谈到了有关科技文明的话题。如果更简洁地从我们的历史知识角度讲，全世界被创造出的巨大文明应该有两个，那便是罗马帝国文明和前汉至后汉时期的文明及其后达到巅峰的唐代文明。后者被称为中国古代文明。我认为，创造出了与此相媲美的文明的国家应该是美国。在过去的 200 年里被创造出的美国物质文明的规模非常巨大呀。中国能否创造出与之相匹敌的文明呢？我们难道不应该将这一主题融入思想，踏踏实实地开展研究吗？研究的内容包括：能够与美国比肩或实现超越吗？中国能否创造出如此巨大的文明？我认为这一时期应该是泽田先生的有生之年，即在岗位上从事研究工作期间。如今，中国无论什么都去模仿、制造、出售，长此以往，能否创造出巨大的文明呢？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呀。因为所谓的技术，并非如此轻而易举便能够开发出来的。与我家一山之隔，对面就是磁悬浮的实验线。

泽田：是磁悬浮列车吗？

小岛：磁悬浮的试验已经进行了 10 多年。他们正在通过车辆运行试验，不断、反复地逐一解决遇到的问题。中国的磁悬浮则省略了这一过程，因为是从德国获得技术并引进国内的。虽然说迄今尚未发生过事故，已然在上海至杭州区间投入了运营，但最近毕竟还是出现了反对铺设的呼声。

发对的理由之一是科学家们认为“存在电磁波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另一个理由则是“不能实现盈利”。目前出现了持上述两种理由的反对者。

泽田：电磁波的影响是中国提出的吗？

小岛：日本正在进行有关是否存在电磁波影响的试验，而对方（中国）却不进行试验，无论什么东西，都要从外国引进全球最为先进的。他们不是在宣传“我国是世界第一，在全球范围内最先实现了磁悬浮列车的实际运营”吗？

泽田：的确如此。这样看来，问题出现在成本和环境两方面呀。

小岛：所以说，中国应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引进技术。中国的新干线是今年投入运营的吧。这一新干线技术是由日本提供的，但受到民族主义及反日情绪的影响，没有公布技术提供方。岂止如此，中国方面甚至将之说成是“我国自行生产”。中方没有公布过“从日本进口车辆”。而且，据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人说，他曾查阅过（某）电子邮件，其中将新干线的名称——使用了 CHINA 中的“C”、RAIL 中的“R”及另一个英文字母“H”（HIGHSPEED 之意）的字头，原意为 China Railway Highspeed 的缩写——解读成了“China Ru Hao”（中国耻辱号），如果当局者不将从日本引进的“疾风型”列车说成是“我们的技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是不会答应的。这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开发出新型东西来吗”的问题。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尼达姆先生所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将永远无法实现了吗？

事实上，中国没有过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我在访问中国

时曾指出，“你们致力于发展现代科学至今不是已经过了 50 年吗？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呢？你们考虑过这件事吗？”。在日本，汤川秀树先生是最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是步入高速增长期后不久的事情。其研究项目的获奖理由是之前曾进行过理论印证。

汤川先生以后，有多少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有 13、4 人获过奖呀。因此，我才说了以下一些富有刺激性的话：“如此强调科学、现代科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且在这 50 年里花费了如此多的资金，培养出了许多人才，但却没有一位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这是因为中国人头脑愚笨？中国的体制不行？只是一味地模仿？我们能够想到的难道不只有这些吗？”即使是我在访华期间说了这些话，中方也无理由逮捕我吧。如果是因为我说了这些话而遭到逮捕，中方也会受到影响，而且，我在中国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会上税的。所以，我才会自由地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泽田：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希望您能就人才培养方面谈一谈。您离开亚洲经济研究所后，转职到大东文化大学执教。在任期间，您制定了怎样的教学计划呢？同时，在授课内容方面，您自己希望讲授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小岛：由于我的授课内容不限于中国，而是整个东亚及亚洲，所以，如何激发出不关心亚洲问题学生的兴趣尤为重要。再者，对讨论班的学生而言，“写出独立思考的问题”非常重要。现在的学生多会利用电脑将摘自互联网上的他人文章拼凑起来敷衍呀。

泽田：是通过拷贝和粘贴吧。

小岛：所以，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去写才行。

泽田：那么，在您的讨论班里，文章全部要求自己写吗？

小岛：不是的，因为我很晚才发现了这种情况。加之我不太熟悉电脑，也曾很相信学生们。这些就是我的授课基本条件吧。总之，我希望学生通过我的授课，能够了解一些诸如“日本社会仅靠日本一个国家是无法生存的，如果不是基于从全方位与亚洲开展相互交流，日本社会将无法生存下去”。

泽田：想再请您谈一些具体概况。您在大东文化大学时，每周有多少节课呢？

小岛：包含研究生院的授课，大概有 12 课时。

泽田：有 12 课时呀。

小岛：是的，包括研究生院的授课。

泽田：在这 12 课时中，包含有您方才谈到的内容，授课是面向哪些学生呢？

小岛：面向 1 年级学生，是“亚洲概论”课和另一科的“东亚经济”课。

泽田：这样说来，您是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了这两科上的吗？

小岛：也说不上是培养，总之，是希望能够激发起他们的兴趣。由于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对中国表示出关心，所以当时有关中国的课非常之多。现在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泽田：是这样呀。当时，大东文化大学里还有白井佐知子和内田知行两位老师吧。那是有关中国课程最为充实的时期呀。

小岛：哦，不清楚是不是最充实的时期呀。

泽田：当时的研究费中，大学拨出部分大约有多少呢？

小岛：40万日元。

泽田：这40万日元是全部由教育部门拨付的，还是另外受到外部委托，并将相应部分的资金划给教育部门的呢？

小岛：你说的外部委托是指？

泽田：您没有过从外部领取研究费，并以教育项目名义用于该项研究的经历吗？

小岛：从没那样做过。

泽田：这么说，是从大东文化大学筹措了40万日元研究费，将之用在了教育和研究里吗？

小岛：是呀。因为到了50年代后，我也不再有上大学孩子，家里的钱开始宽松起来，因此也都用到了研究中。

泽田：是您自己的钱吗？

小岛：嗯，曾用过很多自己的钱呀。因为光是书籍就花掉了100多万日元。

泽田：是指每年花掉100万日元吗？

小岛：是的。最近花的少了些。因为书已经没有地方可放了。加之视力不太好，即使买回来也读不成了。

泽田：到这里，受台湾方面委托的采访内容大体已经结束。最后想请您讲一句留给世界或后世的话。

【第四部分】

小岛：是后世吗？

泽田：这里（调查表）标有“（记录）将永久保存于台湾”字样。

小岛：我还不想去坟墓呢。说点什么呢？

泽田：在中国研究这个框架里，有没有您所希望做的事情，也就是非常想做的事情？

小岛：这样的事情要多少有多少呀。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每年都会出现大量的事情。虽然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如果列举其中几个的话，首先是有关现代中国经济史的事情，我一直想写一部 60 年史。我希望自己能够活到那时。

由于对华评价的翻案，如人民公社非常糟糕啦，无论什么都归咎于文革啦等，中国出现了非常多的相关资料，虽然我认为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介绍会耗费很多的精力。总之，这是以为对方（中国）的资料已经变得非常丰富。建国六十周年将是 2、3 年后的事情吧。

泽田：是 2009 年，还有两年。

小岛：是呀。由于坟墓已在眼前，所以我想研究现代中国经济、“60 年史”的通史，这一想法最为强烈。接下来的另一个题目是关于城市化和过疏化的问题。从以往的经验看，除日本之外的欧美发达国家大城市当人口增加到 800—900 万时便停止了。欧美各国没有超过 1000 万人口城市的国家。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大城市全部位于亚洲各国。韩国首尔的人口为一千几百万，聚集了韩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日本，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京经济圈也或许与此大体相同。中国的大城市人口将会膨胀到何种程度？中国将出现多少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巨型城市？中国能否撑得起来这些大城市？这些都将成为问题呀。而这些问题将不太会写进现代中国 60 年史中。前面提到的独生子女政策将导致的农村社会的灭亡——这些问题将伴随着高增长而迅速凸显。我想将这些内容归纳起来写一点什么呀。

泽田：十分感谢。现在刚好到时间，感谢您接受长时间的采访。